本书有三个“第一”：企鹅欧洲史序列的第一本，企鹅欧洲史系列中时间跨度最长（前1750-425），也是该系列中篇幅最短的。本书历史时间跨度与书籍本身体量的严重不相称，出于作者西蒙·普莱斯和彼得·索恩曼在写作时做了相当大的取舍，让本书在企鹅欧洲史系列中显得“独树一帜”。其一，本文主要叙述的只有基本的社会史和政治史，缺乏思想文化史的部分，或许是作者默认读者已经对古典时代希腊辉煌的学术人物，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有了充分的了解；其二，本书大量运用考古发现来作为社会史、政治史的证据，而本书的结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围绕着考古材料书写的，这意味着许多没有出土（出水？）材料支撑的历史问题在本书中往往得不到讨论，因此本书的政治史部分也相对匮乏。

本书也有一些闪光点，即作者关注的视野并不局限于希腊、罗马等传统“欧洲中心主义”者叙述的焦点，而是对为古典欧洲带来了深刻影响的埃及、波斯以及东西地中海区域的其他民族。另一个优点是本书会在正文中不时穿插一些专题式的“今昔对比”，将西方近代史的内容与古典时代相比较，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对美国革命和罗马的比较，作者指出罗马历史的伟大先例确实对美国革命者（如托马斯·杰斐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形成观点时起了作用，“和古代历史的对话将有助于将作为自由堡垒的新生共和国与欧洲古老的封建君主制度分割开来”，杰斐逊曾在1795年说到，美国“是按照诚实而不是武力的原则”进行统治的“实验”，“在罗马共和国时期之后还没有出现过”。虽如此，综合上面的优缺点来说，本书作为欧洲史丛书的一册，与其他分册相比，仍旧是不太合格的。本书未能在古典欧洲史的任何一个方面达到一流的水准，无论是对考古材料的整理，对现有历史研究的综合，还是仅仅以通俗的方式向一般知识大众讲述欧洲史。

不过要说本书没有为读过《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等比较出众的早期欧洲史入门的读者带来一些除了考古发现以外的新讯息，那也是不对的。其一，本书所描绘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地方行政机制，与罗马帝国前期颇为相似，行省地方精英基本上保持自治，只要服从中央并承担一定的义务（如上缴赋税），行省总督就不会对地方事务做过多干涉；其二，雅典人对于“祖制”亦表现出相当大的尊崇，作者这样认为，在雅典人的思想中抵制改革是一项原则，克里斯提尼在雅典大众记忆中迅速消失恰恰表明了其改革的成功。随着民主政治的确立，雅典人将其作为一种“祖制”而非“新政”加以接受。其三，在本书中作者判断，无论是希腊化还是罗马化，都不是上层有意推行教化政策的结果，当地文化的转变往往是由下而上驱动的，因为“希腊的”或“罗马的”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帝国时代就意味着权力与潮流，异文化的人们有强烈的动机向其靠拢。这与近代天主教传教士作为宗教与欧洲文明的传播者的双重形象产生了对比，在天主教欧洲的语境下，“文明”的传播具有更多的主动性。

总的来说，本书的定位是颇为尴尬的，如果本书不是作为企鹅欧洲史的一册，或许它会拥有远远少得多的读者。